

特色经济 + 公共财政

——走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缩差共富之路



徐青青 / 摄

■ 刘 亭 / 文

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地区间的“缩差共富”，还是要按各地基于资源禀赋和优势的特色经济发展为基础，同时中央公共财政做到“再分配到位”，也即“特色经济 + 公共财政”、二者“各展所长、各得其所”的路子去努力，而所有的相关政策激励和政绩考核指挥棒，也都要在二者的深度融合、相得益彰上去出实招、显实效。

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全民共富，提出了新要求。浙江作为全国唯一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，将

“推进山区 26 县整体跨越发展”，作为推进共富的“十大标志性工程”之一，从而在省域范围内有力地促进了市县域的协调发展和“缩差（缩小地区差距）共富”的进程。

众多的政策举措和实际操作，在此毋庸赘述。其中的基本大思路就是“生态经济+公共服务”。也即一方面按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主政期间提出的发展“生态经济”的方略，把山区县生态环境优越、生态资产丰厚的最大潜在优势充分挖掘和发挥出来，发展“生态农业”“生态旅游”和“生态工业”等生态富民业态，将“绿水青山”实实在在地有效转化为“金山银山”，完善“产业造血”机制。另一方面，通过各种基于水源水

质、生态公益林、林相改造补贴、GEP 核算奖励等的生态补偿措施；基于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（简称“消薄”）、美丽乡村建设、传统村落保护、山海协作工程（省内地区间的“先富带后富”工程）等的转移支付措施；基于提高养老金标准、升级“医共体”“教共体”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的社会保障措施，对山区 26 县尽到省级政府和财政应该尽到的职责，完善“财政输血”机制。我以为，将发展生态经济和完善公共服务两者有机结合、相辅相成；把“授人以渔”和“授人以鱼”“两手抓”，“两手都要硬”，才是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和地区“缩差共富”的“大道至简”。

在我看来，省内山区 26 县的产业经济发展得再好，也不能有意无意地把他们的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的增速，去和平原及沿海地区进行攀比。这既不现实，也不合理，更是对缩小地区差距的一种误读！其实只要是各地的资源转化潜力，在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同时，都尽量挖掘和发挥出来了，这就是科学的发展，这就是高质量的发展，再不当苛求于这些地区还要多做什么！但他们在事实上为全省维护生态屏障、保护生态环境、增值生态资本所作出的贡献，必须得到及时、足额的补偿；而山区县老百姓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，更应当通过省级财政的再分配去加

以缩小。

以小见大、滴水映辉。一省如此，一国难道不也是一个道理吗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地区间的“缩差共富”，还是要按各地基于资源禀赋和优势的特色经济发展为基础，同时中央公共财政做到“再分配到位”，也即“特色经济+公共财政”、二者“各展所长、各得其所”的路子去努力，而所有的相关政策激励和政绩考核指挥棒，也都要在二者的深度融合、相得益彰上去出实招、显实效。

（本文作者系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副主任、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）

ChatGPT 之父的天才历程

■ 徐迅雷 / 文

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近期推出的 ChatGPT，迅速成为炙手可热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品。OpenAI 的掌门人，美国“85 后”企业家山姆·阿尔特曼，被誉为“ChatGPT 之父”。

ChatGPT 推出两个月，用户超 1 亿，这是典型的“火出圈”而不是“火在圈”。

OpenAI 首席执行官山姆·阿尔特曼（Sam Altman，简体中文有的干脆译为“奥特曼”），是俄罗斯移民的后代，1985 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一个条件优渥的犹太家庭，从小就是让人羡慕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

在阿尔特曼的成长之路上，有许多重要的“关节点”。第一个重要“关节点”，是他 8 岁生日时，获得了重要的生日礼物——一台电脑，由此他对计算机和互联网产生了浓厚兴趣。当然，他不是拿电脑玩游戏，而是做编程，从小做代码就做得很漂亮。

2003 年，18 岁的阿尔特曼被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录取。斯坦福临近硅谷，受科技创业氛围影响很大。2005 年读大二时，阿尔特曼迎来第二个重要“关节点”：放弃学业，创业办公。他致力于开发一款基于用户位置的社交网络应用程序。到了 2012 年，公司并未获得很大成功，最后低价出售。

2015 年，阿尔特曼迎来第三个重要“关节点”：他和特斯拉 CEO 马斯克等人一起，创办了 OpenAI 公司。彼时阿尔特曼距离成功还很远。

2019 年，阿尔特曼迎来第四个重要“关节点”：OpenAI 接到微软 10 亿美元的巨额投资；发力研发 ChatGPT——当时被称为“生成式人工智能”。现下，ChatGPT 火爆了全世界。

阿尔特曼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天才，在思想理念方面也是“一等一”的。“你需要建立一个难以复制的企业—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。”他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“如果你能学会先考虑市场，你会超过大多数创业的人。”他是坚定的“市场派”创业创新人士，他说，“如果你没有向市场提供足够好的产品，任何增长技巧、绝妙的营销想法或一流的销售团队，都成不了救命药。”

天才不走寻常路。富有探索精神的阿尔特曼，从求学到创业，都是不走寻常路。天才往往有这样那样的“缺点”，需要家庭、学校、社会的普遍宽容，这一切阿尔特曼都遇到了，所以才不会半途而废。

天才的成长，最需要“活的”教育环境。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，最怕就是被“锁死”：知识被“锁死”，那就是退化；思维被“锁死”，那就是固化；智慧被“锁死”，那就是蛻化；想象被“锁死”，那就是冥化；创新被“锁死”，那就是石化……教育的“锁死”和“锁死”的教育，绝不可能有“天才”。

爱因斯坦说得好：“每个人都是‘天才’，但如果用爬树的能力来评断一条鱼，它将终其一生只能认定自己是个笨蛋。”阿尔特曼就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头“鲸鱼”，还好，他没有被要求去爬树。

（作者系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）

戒空防左、戒急用忍和『四重』优先

——面上推进共富的若干想法

■ 刘 亭 / 文

这次再推共富，不能脱离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仍是发展中国家这个“最大的实际”，不能脱离 40 年改革开放、经济基础已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，不能脱离人类开始进入信息社会和数智文明时代的实际……

就面上推进共同富裕这项工作，我提点不成熟的想法。

第一，这项工作为指导思想上要“戒空防左”。中央提共富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新形势的要求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，是适时、正确的。

不坚持共富，社会主义要“失魂落魄”，也容易引发社会失衡和社会撕裂甚至是社会动荡，显然不行。但怎么个“坚持”法，大有讲究。十九世纪初至西门、傅里叶和欧文等人搞的共富实验，出发点都是好的。虽然也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丰富的“思想营养”，但恩格斯仍然把它们归为“空想社会主义”。

这次再推共富，不能脱离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仍是发展中国家这个“最大的实际”，不能脱离四十年改革开放、经济基础已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，不能脱离人类开始进入信息社会和数智文明时代的实际。如果不能在上述前提下“实事求是”地认知共富，那共富实践就很有可能会出现重大偏差。从目前社会舆论、公众心理及各方面的反映来看，“空”和“左”的问题还是存在的。譬如现实生活中对民营经济有意无意的淡漠、动摇和排斥，就是当前对推进共富现实的干扰和阻碍。

第二，政府部门推进这项工作要“戒急用忍”。为什么好心最后没有办成好事？历史的经验就是急于求成、操之过急。现在也有若干表现：部署上的“大而全”，要求上的“高而急”，布置上的“多而细”，考核上的“密而实”，舆论上的“虚而乱”。包括“高大上”的宣传、行政化的推动、功利性的考核，加上上下一般粗，唯上不唯实，也是弄得上下身心俱疲。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习总书记对共富是项“长期任务”，须“脚踏实地、久久为功”的定位和要求上来，力戒喊大口号、定高指标、说过头话、许空头愿、办火急事。在共富这种敏感问题上，尤其不能三番四复、来回折腾，包括大呼隆、运动式，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“塔西佗陷阱。”

第三，建议面上推开这项工作前要“四重”优先。哪“四重”优先？一是“重研究”。现在看，思想理论和政策法规的研究是严重滞后的，针对性也是比较差的。网络舆情乱象干扰，是因为主流媒体和宣传教育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突破，旗帜鲜明的立场态度、入脑入心的娓娓道来。合法的私有财产不也是“神圣不可侵

犯”的吗？“消灭私有制”是怎么回事？民营经济就是“私有制”吗？为什么只对资本“设置红绿灯”？平台经济就是“垄断”吗？能否说“共同富裕就是‘普遍富裕（指享有底线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）基础上的差别富裕’”？即便是想要“办好事”，也不能只凭“毛估估”，起码是要进行长时段的精算的。如此等等，虚实两方面的研究不到位，就难免会在实际工作中出现折腾。

二是“重基础”。中央非常强调“基础性制度安排”，这固然需要中央和地方的共同探讨，但主要还是属于中央的“顶层设计”。譬如，国家和社会都有一个治理的问题，治理又主要涉及百姓和政府两个方面。现在连一个人口数据都五花八门，难道就不能删繁就简、九九归一，搞一个全国唯一权威和基准的数据吗？政府这么多部门都与推进共富有关，但能不能确立起一个“家有千口、主事一律（法律制度，由‘主事一人’演绎而来）”的高效运作机制来？这两个基础性的东西不搞好、搞准、搞到位，地方和部门的很多努力，最后很有可能都是“空转”和“虚耗”，有时还会制造出新的“麻烦和问题”来。

三是“重改革”。共富在中国语境下，40 年前是一个改革的问题，今天仍然还是一个改革的问题。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各地情况千差万别，共富又是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、不能办砸的事情，稳中求进、行稳致远当然要抓好试点、稳步推开。但是，现有浙江的共富试点实质性的改革突破并不多，因为一涉及“实质性”，就要触及中央事权。譬如说，改革本来要“变法”，但条线上的要求，基本上就是“于法有据”，又缺乏一个辩论和博弈的机制，这还怎么变？改革可以争取“尚方宝剑”，但深水区的改革都是综合性、一体化的，不知谁又能来授予这柄宝剑？现在的行政管理还是“自上而下”“谁大听谁的”，凡改革事项也都要上报批复，如果改革请示“泥流入海无消息”怎么办？诸如此类，上级不放权、改革不成气候，是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。

四是“重共识”。这里讲的“共识”，特指解放思想、守正创新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“四敢”：“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，让干部敢为、地方敢闯、企业敢干、群众敢首创”。说得太好了！但我们也要想想，为什么过去敢而现在不敢了？大的政治气候和舆论环境没有松动，“四敢”会不会成为“空谷足音、对牛弹琴”？守正创新的“守正”，应当是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，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，坚持市场化改革开放不动摇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这是当下中国社会最大的共识，也理应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最须坚持的“政治正确”。

（本文作者系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副主任、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）